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Department of Curriculum Design & Human Potential Developmen
第十一期
e-news
103 年 9 月 30 日出刊

主　題　：　認　同　與　差　異

主編的話

今（2014）年三月的太陽花學運，雖然是由看似經濟議題的兩岸服貿協議引發，各方的意見卻反映出兩岸關係與國家認同才是更根本的原因。所謂的「認同」，具體而言即是對「我是誰？」、「我要成為怎樣的人？」、「什麼是有意義的生活？」、 ……《詳全文》

學術話題

【從交換學生的經驗看太陽花學運—延伸的兩岸國族認同……許瑞珊/撰】

【一位韓戰來台外省士兵的離散經驗與認同—崔爺爺的生命敘說故事……崔佩芸/撰】

【中國結？台灣結？一個芋頭+蕃薯家庭的家國認同與生命經驗……樓昕/撰】

系所動態

◎ 校友回娘家分享

◎ 新生入學指導

◎ 103 級教育碩士班新生座談

◎ 103 級多元所新生座談

◎ 103 級科教所新生座談

◎ 103 學年度教育博士班師生座談

學術活動

◎兩岸雙華論壇（東華＆清華）學術交流活動

校友社群

※《人物專訪》蘇羿如—一段走唱的學習歷程回顧

※《書評》Language, Culture, and Identity among Minority Students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Hui.

※103.07-103.09 課程系系友榮譽榜

【編輯室】

發行單位：
國立東華大學
花師教育學院
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發行人：劉唯玉
總編輯：王應棠
編輯群：李　崗
李明憲
林慧絢
王應棠
版面設計：王鴻哲
蘇素珍

【下期預告】

課程系電子報第 12 期預定於 103 年 12 月 31 日出刊，主題為「為您（們）加值」。學術資源可以是硬體、軟體、學程規劃、研討會，更可以是教師、學生、社區與整個社會；加值的內容可以是研究能力、教學實務、就業能力或地方促進。學術資源繁多、「您（們）」亦沒有界線。

在此課程系電子報誠摯的邀請您在此發表您的看法或心得，投稿者請將稿件寄至電子報助理蘇素珍 (smallchoung@yahoo.com.tw)。

【徵稿啟示】

無論您對課程系有任何想法，或對教育現況、教育理念及現行教育議題等有精闢的見解，歡迎您投稿課程系電子報！稿件請寄至課程系電子報助理 蘇素珍（smallchoung@yahoo.com.tw）

國立東華大學 花師教育學院
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97401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一號
No. 1, Sec. 2, Da Hsueh Rd., Shoufeng, Hualien 97401, Taiwan, R.O.C.

主編的話

今（2014）年三月的太陽花學運，雖然是由看似經濟議題的兩岸服貿協議引發，各方的意見卻反映出兩岸關係與國家認同才是更根本的原因。所謂的「認同」，具體而言即是對「我是誰？」、「我要成為怎樣的人？」、「什麼是有意義的生活？」、「我應該怎樣追求這種生活？」等與自我實現相關的問題的回應。認同因此是人們經由理解其處境，並對此一處境作出的反應。認同的建構是一種不斷進行的詮釋活動，它一方面受行動者在特定處境中的機會與限制所左右，一方面又受其自身既有的特質所影響。認同給予我們一個位置，並呈現我們與置身的社會之聯繫，揭示出個人在社會世界中如何調適與再出發的基本問題。然而，在社會急速變遷中，傳統的確定性不再存在，從全球到地方各種尺度的社會、經濟、政治變遷導致矛盾而破碎的認同。當認同成為議題，就是認同危機的浮現之時。尤其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文化均質化趨勢所導致在地認同的碎裂化現象，激發了認同的危機，但同時也會有抵抗發生，以強化並再確認某些族群與地域認同，或誘發新認同位置的浮現。

本期主題聚焦於省籍情結與國族認同，**許瑞珊**的「**從交換學生的經驗看太陽花學運—延伸的兩岸國族認同**」從日常生活的兩岸差異現象連結太陽花學運的反思，討論自身作為台灣在地人的台灣意識。**崔佩芸**的「**一位韓戰來台外省士兵的離散經驗與認同—崔爺爺的生命敘說故事**」，則透過親人的個人遭遇與歷史的偶然際遇，交織出對台灣與大陸的複雜認同，這是無法用簡單的愛台灣或愛中國的對立邏輯來理解的。**樓昕**的「**中國結?台灣結?一個竿頭+蕃薯家庭的家國認同與生命經驗**」更以一家三代的複雜族群背景，指出認同可以是多元的和包容的，重構出一個可以貼近當前處境的自我理解與對未來的想像。

本期主題之外，還有一篇校友介紹及一篇深度書評。**蘇羿如**畢業於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博士班，跟我們分享她這個土生土長的花蓮人一路走來的學習經驗。**張立之**的「**書評：Language, Culture, and Identity among Minority Students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Hui**」，探討中國兩位少數民族—回族國小女學生的生命經驗對他們身份認同的建構所造成的影響，以及學校教育對於他們的意義。除了與本期主題相關，透過中國對待少數民族的教育經驗，可以給我們對於原住民及新住民的教育當作一面鏡子加以思考自身的課題。

主編 王應棠老師，現為本系副教授。

專長領域包括文化詮釋與批判、空間論述與實作、文化研究導論、質性研究、現象學取向研究、教育與社會方法論、文化社會學、詮釋研究取向等。

【回首頁】

從交換學生的經驗看太陽花學運延伸的兩岸國族認同

本文作者：許瑞珊，
目前為東華大學女性研究社團員，
亦為為東華大學多元所碩士班學生。

一、沒有意識兩岸問題之前

對於兩岸的認同，我一直都沒有意識要站在什麼立場，不曾關心政治議題，生活在安逸的圈子裡，以個人資本主義式的思考，認爲有沒有統一應該都無關緊要，只要吃得飽生活過得下去就夠了，兩岸的問題離我太遙遠，我也無法決定什麼，索性就都不管了，只要能夠溫飽，不管誰是執政者都沒有關係，只要好好賺錢過生活就好，這是以往的心態，沒有太強認同台灣的意識，也不覺的大陸不是我們的國家，只是面對運動賽事不能升國旗，覺得非常的奇怪，隱約中了解我們不是一個國家，卻又覺得好像是一個國家，我不喜歡讀歷史，對於台灣跟大陸的過去完全不感興趣，就如同一開始提到的認爲過好生活就好，所以我一直不曾認真思考關於統獨的問題，一直到學運之後的反思，好像才明瞭了一些。

二、交換學生經驗

大學大四下學期我到中國上海交換學生半年，當初會出去是因爲課修習的差不多，也想感受中國當地的文化，並且去各處旅遊，體驗不同的學習環境，因此，我也到各省分去看看不同的生，活兩岸的語言雖然可以溝通，但生活習慣上、想法上還是有許多的不同。

性格的差異應該因人而異，不過整體來說大陸的人比較兇悍，不管是在都市或是鄉下，他們溝通的方式很直接，有時候甚至會以爲是在吵架，大陸人直來直往的說話方式，與我們台灣人的溫柔、溫文儒雅比起來有明顯的不同，大陸對待人、朋友的方式非常直接，像是如果他要你幫他拿東西，他會直接把東西遞到妳的手上，不會先詢問可不可以幫忙，即使是服務業，能遇到會對你微笑的那簡直是人間稀有，有一次我去一家高級餐廳吃飯，裡面的人竟然對客戶微笑讓我嚇了好一大跳，還有一次，在路上會遇到讓行人的車子，讓我跟朋友對看了好久並感到不可思議，可以想像兩岸之間人們互動的模式有多大的差異。

在學習方面上，一直聽說大陸的競爭力非常大，上課會搶著坐第一排、圖書館一早會排隊、讀書到很晚，這些傳言我交換時都沒有親眼見過，我去的學校不算差，是大陸一本的學校，大陸大學有分三本，一是最好、三是最差，但並沒有看見拼命念書的情況，大陸學生跟台灣學生上課情形是差不多的，上課玩手機、打瞌睡、遲到，當然認真的同學還是很認真，基本上是大同小異，比較不同的是課外的學習，寒暑假、或是平常上課晚上，他們會花時間去學習課堂以外的事情，像是補習英文、考證照等等，從這裡可以感受到他們的競爭力，和台灣的同學下課以後玩社團、服務學習是非常不同的，他們很會投資自己，對未來的路也想的很早，大一大二就知道自己未來要做什麼，他們的競爭力大概在這點上勝過台灣的學生吧。

在生活環境上，差距可就是非常大的了，以學校爲例子，我在的地方是上海，一般對上海的印象就是黃浦江、東方明珠、高樓大廈、距離市中心離我的學校大約只需要二十分鐘的地鐵車程，然而在生活環境卻比台灣還差，學校的宿舍，沒有獨立的衛浴，洗澡需要出宿舍到澡堂，澡堂只有一排蓮蓬頭，沒有隔間，沒有隱私可言，另外，學校大門可以自由進出，很多社區的人沒有受到管制就可以進出學校，聽說常有怪人或是變態出沒，我去的期間就聽聞兩次，當地的人衛生習慣不好，到處都可以看到有人在吐痰，路邊小便也常看到，我去各省份旅遊時，吃東西的免洗碗筷雖然都標示是環保消毒過的餐具，可是看起來還是不太乾淨，我們都會用熱茶再洗過一遍才敢使用，學校吃飯的地方就是食堂，不像台灣的學校多是吃外面的店家或夜市，校區旁幾乎沒什麼東西好吃，三餐都是在食堂解決，菜色非常的油膩，需要泡過湯水才有辦法吃，不挑食的我都覺得太過油膩，可見的兩岸的飲食習慣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在交通工具上，因爲地廣的關係，他們的火車分很多種，從最低等的到豪華的，程度差異非常大，最低等的可以塞很多人，速度很慢，最快的高鐵則是兩個人一間，可以躺著看電視，門可以關起來像包廂一樣，比台灣的高鐵還要快，而不管是搭哪一種火車進去都需要像搭飛機一樣要安檢，等時間到了才可以進月台，跟台灣的很不一樣，而馬路上電動車是最常見的，很少有摩托車。

在食衣住行上兩岸的文化有差距，有些差很多、有些很少，就像台灣南台灣與北台灣都有差異了，更何況是兩岸的差異想當然爾就更大了。旅遊回來以後，沒有貶低他們文化的感覺，許多風俗文化上我只是覺的有差異，但是某些部分不免會嫌棄，像是衛生問題、洗澡問題、隨地吐痰的習慣，對我來說是不太能夠接接受的，回來時我都跟人分享，當地的科技、經濟、各種產業可能都超越我們，可是在人的素質水準上，我想是落後我們十年的，這大概是台灣最能自豪的地方了。

在大陸時常常被問到你認爲台灣與中國是什麼樣的關係，我通常不回答，就像的第一段描述的，我實在是不關心這個議題，而且也被學校老師告知，在大陸最好不要談太多統獨議題，但是大陸的同學卻對這議題很有想法，雖然我沒有和他們深聊，但他們都肯定說台灣就是大陸的，我不知道他們這樣的觀念到底從哪裡來，相較於我們台灣的學生，跟我同一批去交換的同學，都和我一樣不談這問題，或是內心覺的就是兩塊不同的地方，怎麼會是統一的呢，有不同的政權、管理、總統，不同的邦交國，不論怎麼說在國家形式上，都不會是統一的一個國家才對，這個問題，到我回國之後還是沒有繼續深談下去，因爲即使我在大陸待上幾個月，我的認同與關懷沒有變的更多，我還是覺得沒有什麼好談的，政治、國家議題都離我太遠，對於底層的小老百姓，關心民生事情才是最值得注意的。

三、太陽花學運爆發

太陽花學運的爆發讓我重新去思考兩岸問題到底重不重要，當時我的出發點是針對反黑箱以及政治的黑暗，我好像應該站出來做點什麼，我並不反對服貿，因爲我不認爲台灣有能力不與其他國家合作，沒有經濟貿易的往來，有人提出，若是簽署的對象不是中國而是其他西方國家，台灣就不會這麼反對了，我其實很同意，換做是其他國家我就沒有那麼擔心了，因爲別的國家跟台灣經貿就只有賺錢的意思，但我不相信中國跟台灣合作也只有單純的經濟層面，若是大陸想要賺錢，根本不缺這台灣塊小餅，以他們現在強大的優勢，跟其他有實有名的國家簽契約所獲得的利潤，肯定比跟台灣簽來大的許多，也可以想見大陸是要透過經濟吃掉我們這塊已經流離很久的國土，就像對待香港一樣，一開始給些甜頭到最後卻不得不依賴中國，我當時去交換時香港的室友，就很嚴肅的跟我說，我們台灣一定要守界線不要變得跟香港一樣，非常的可憐，地小、工作又辛苦，還要靠大陸來觀光才可以生存的下去，台灣漸漸也有這樣發展的趨勢，看到花蓮有好多的陸客，有時候都懷疑我是在台灣還是大陸了。

種種因素分析過後的利弊得失後，我開始站出來反對服貿，在臉書上看關於服貿的訊息，聽了很多大家對於服貿的看法，以及專家學者的意見，但發現後來我對經濟根本不在乎，雖然服貿通過了以後第一個直接影響就是收入，但我擔心的不是經濟，而是文化的影響，從原本的反黑箱意識到經濟合作影響的根本不只經濟，還有更多的文化交流、許多自由出版、言論的限制，甚至是醫療體系的改變，對於我關心的同志議題也會有很大的影響，對於中國可能入侵台灣感到很害怕，且台灣貧富差距日益增大，不希望看到金字塔頂端更頂端，在不斷的與人講述立場之後才發現，原來我害怕的是文化上交流改變，雖然現在陸客這麼多來台，兩岸交流如此頻繁，文化的交雜早已產生，但我總感覺服貿大門一開，文化上的雜揉就變得更快速了，我不想要看到大家學會滿地吐痰、人心開始自利，變的不溫文儒雅、不熱情，我設想當文化交流可能更伸入，我開始有了擔憂，雖然認爲台灣文化可能比較優越一些，但是優越不代表會被傳承，當然說不準到底是哪一方的文化會比較強，只是大陸這樣多的人，隨便吐兩口痰都可以把台灣淹死的情況下，我的擔心還是很可能的，因爲這樣我也才明瞭原住民對於漢人的強權，爲什麼會這樣的抵制與這麼有強烈的心要保有傳統了。

四、開始認同台灣

沒有使用太多書本中所提的省籍情結，因爲那對我來說並不是考量的方向，我沒有省籍情結，認識的人中即使有外省人的後代也沒有意義，因爲這個時代的混雜性已經太高甚至到無法分辨了，對我來說就像閩南人或是原住民一樣，甚至比這種族群的力量更小，我的祖先也是從大陸來的，只是來的時間早晚而已，況且外省人的後代跟我們也一模一樣，根本沒什麼好分的，所以也沒有所謂國民政府遷台後的省籍問題，此文的認同論述完全是來自於我對文化的影響，而沒有政治上的歷史遺骸， 雖然不能完全肯定到底有沒有政府的政策或歷史影響我，但本文先不著墨這部分。

認同的概念與差異中提到，『認同標示了過往，與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文化與經濟之間的糾結，認同是我們日常生活、與從屬和宰制而產生的經濟和政治關係之間的交接處』(認同與差異的概念，p26)，我想我因爲這樣的事件開始更加認同台灣，就像這段文字提到的，認同包含了我過去生活的歷史、關於社會、文化、經濟的面向，而這次的運動議題也緊緊的扣著這些圍繞，也難怪我會開始關心了。

開始去關切服貿對我們的影響，就是因爲開始認識到大陸與我們的差異，若假若新北市要與桃園縣簽定服務貿易協定，那肯定不會有人反對，因爲即使再怎麼交流也只是台灣內部的影響，對於彼此的風俗文化都相同的情況下，影響不會太巨大，反

觀是對大陸，那差異可就非同小可了，因爲去交換學生而意識到我們是不同的族群，即使說著同樣的語言，我還是知道我們是不同的，傳統與文化並不單純透過相同語言而就認定是同一類，(認同的力量，p8)提到『沒有一種認同是本質性的，也沒有一種認同本身可以不根據歷史脈絡就具備進步或退步的價值。』我後來才了解認同並不是透過特定的物化、本質化的相同而產生認同，所以說同樣的語言可能會使我感覺相較於西方我們與大陸是同屬中華文化，但不會因爲說同樣的語言就認爲我們是同一類，不會是因爲本質上的語言相同就認定。

『認同被視爲具有本質上的核心，可將某團體標示出來，另一方面，也被視爲某種偶發，也就是認同如同構成各種要素相交會下的產物』(認同與差異的概念，p47)，我並非完全排斥本質論的觀點，就像我認我是客家人，其實最一原出就是因爲我相信血液裡是我的祖先傳承的，但是透過一些客家祭典、語言、族人的集合，我才更加確定我是客家人，我想同樣的經歷也可以應用說我是台灣人的道理，但因爲台灣人的比例很高，這就必須用到想像的共同體的概念，因爲不論我到台灣的哪裡，都不會有人質疑我是不是台灣人，我了解台灣的文化，會使用台灣人慣用的口語，我被視爲台灣人團體的一部分，這些並不是在我一出生就被標示的，而是經過我對文化的學習、對社會規範的認識與遵守，塑造成我是台灣人，而我也確確實實的相信了，因爲都是台灣人，所以當沒有踏出台灣的土地時，我並不會有這麼強烈的感覺，因爲認同是由差異標示出來的，當我處在全部都是跟我性質一樣的台灣人台灣土地上，我自然不用證明我是台灣人的正當性。

『象徵的再現系統不但將差異標示出來，同時也對社會關係做出意義上的解釋』(認同與差異的概念，p65)，這個象徵包含了食衣住行等生活文化上的意義，如同我最前面的描述，我們與大陸人有些文化上的差異，在食衣住行上都標示了差異，因爲這些差異讓我感受到我們是不同社會體系，也從政治上特別有感受差異，他們學習毛澤東思想，我們的三民主義課在我這個年代早就已經不在課綱中，他們很難想像要去投票的樣子，之前我在火車上遇到大陸的遊客，他跟我說某些政治的事情只要官員知道就好了，小老百姓只要安穩過日子就可以，明顯感受到兩地的政治氛圍是差距很大的，透過這些生活上的差異，以及體制上的不同，甚至是實體上的物件，像是去到大陸我們需要台胞證，到了大陸我們不能停留太久，若要延長還需要去加簽，所有的種種類加起來，都讓我感受到我們是不同的兩個地方，不論是在文化上、制度上、心理上，都有差異，因爲差異我更加的認同，我們是不同的兩個地方，不論有沒有統一或是獨立。

關心服貿也關係到我對台灣的認同，以及對大陸的認同，因爲認同看見差異才需要去抵抗，我將這種認同的出現歸因於抵抗性的認同，(認同的力量，p9)，『以族群爲基礎的國族主義，常常是因爲異化感及憎惡被政治、經濟或社會上的不公平排除而興起的。』雖然我們還沒有被異化，還沒有太過度的經濟不公平，但是也有某程度的政治打壓，因此，透過服貿我也看見，我認同台灣，我的力量可能是出自於抵抗性的認同，我對中國的認同小於台灣，前面說過我沒有政治立場，但服貿的議題讓我看見，其實我早已認同台灣，甚至認爲台灣應該要獨立的，因爲對文化的差異實在太大，但文化差異大就要獨立嗎?似乎也不是這樣簡單的推論，否則台灣原住民也可以自己獨立，所以單純文化的差異絕不是分割兩地唯一的理由，還有很多歷史脈絡政治的考量，我最後要回答的並不是談反對台灣獨立或統一，而是若今天兩岸需要統一，如何因應兩岸文化差異的交融，如何建立兩岸人民的友誼與人際關係，並不是政權統一就好的，許多面對兩岸的差異配套措施應該都要想好，否則就會像漢人與原住民一樣，在原住民族與漢人融會的情況下才開始找回自我，雖然堅持單純的歷史與傳統沒有意義，但是如何面對兩者接觸所產生的火花，以及保有傳統創造出的創發的歷史才是應該要被注意的，否則沒有配套措施，讓我感覺非常恐懼，恐懼自己認同的文化被侵蝕，恐懼對岸的勢力強大讓我們的傳統消失，恐懼政治的氛圍，恐懼人的關係變了，但我想這議題不光只是服貿，在兩岸觀光頻繁、政治、經濟、移民交流非常多的情況下，這種文化的議題早就應該被重視，我以台灣的多元文化、多種種族感到榮耀，所以並不對大陸要與我們產生雜融完全排斥，而是這些融合的過程，需要被更仔細的思考與商討解決之道。

我贊成台灣獨立嗎?不，因爲即使獨立了，台灣內部的文化差異性與尊重還是需要更多加強，讓更多人學會尊重多元文化，我贊成台灣統一嗎?不，因爲以經濟爲首要條件的時代，讓經濟控制兩岸的人民，會抹煞掉太多文化與單純的人性，服不服貿是表面問題，背後的兩岸國家延伸的文化、社會等各種面向的交錯，才是最重要需要被看見的事，但是如果再問我一次，我是什麼樣的立場，我可以肯定的說我是台灣人。

今年寒假我的上海朋友到台灣玩，我們相處了好幾天，最後分別時依依不捨，甚至想哭，那是一個很美好的經驗，即使有文化的差異，我們還是可以好朋友，統不統一並不影響我們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只是未來兩岸若是有任何的改變，都希望人與人之間保有這樣良好的關係。

【回首頁】

一位韓戰來台外省士兵的離散經驗與認同
—崔爺爺的生命敘說故事

本文作者：崔佩芸，
目前為為東華大學多元所碩士班學生。

壹、緒論

一、研究緣起與問題意識

在我未進入研究所場域之前，對於族群想像的概念與知識理論的建構與探究僅沉浸在自我想像與詮釋的空間裡，對於回顧歷史只有不斷地揣測過去當下發生的事件，在真實與理論相互交錯之間似乎仍有斷裂的空間。直到在研究所第二學期中上課時，配合認同與差異授課老師課程安排的進度，欣賞一部描述外省人來台的電影—「香蕉天堂」後，引發我對自身週遭的經驗產生許多共鳴與好奇心，而電影故事情節裡，許多細膩又真實的再現也喚起我童年裡對外省爺爺（外公）的記憶。

回憶起小時候，令我印象深刻又害怕的記憶是在夜晚睡寢時間時常聽到爺爺（外公）歇斯底里地大叫、說夢話或驚醒。當時年紀還小的我，對爺爺的行爲與反應無法產生理解與同情，甚至認爲爺爺是生病，晚上會變得像瘋子般的說夢話才會有這些反應。此外，讓我更不解的是每到選舉前或是特定節日時，電視新聞裡會出現像爺爺一樣的外省伯伯們，狂熱地高舉中華民國國旗情緒激昂地喊著愛國口號，看似在人群中突出像在鬧事。這樣的認知直到進入研究所開始接觸族群相關文章與電影時有所鬆動，文本與影像使我再度開啓通往回憶的連結，重新去思考我對外省人在台灣的看法，發現原來我所反應與感覺的人、事、物都是去除關鍵的背景脈絡因素，所以這篇文章將會以所有眼前看見的事物納入歷史脈絡影響來重新檢視。當我的記憶與文本不斷在閱讀時進行對話時，才意識到自己與爺爺之間擁有莫名的距離感，初步探究之後，發現這樣的距離感有部分是因我不解對爺爺過去的行爲，有些則是時代之間的斷裂及台灣過去社會賦予外省老兵的刻板印象所影響。

我與爺爺的關係看似簡單其實很複雜，雖然曾經都住在同一屋簷下，但在過去對爺爺大部分的認識都是建構在外婆的口述，對爺爺的印象只記得小學時期，每天早上爺爺都會買早餐陪我走到學校，途中都沒有交談，更缺少實際的相處與了解。在家庭中，隔代教養的我也時常看見山東籍的爺爺（外公）與閩南客家混血的阿嬤（外婆）不同族群相處上口語與肢體的衝突和差異與無法解釋或理解的現象。因此，我想藉由此研究來揭開我一個身爲孫女對爺爺不解的原因，並且使自己對自家的外省爺爺及相同處境因韓戰來台的外省老兵放置在情境脈絡下做更深一層的理解與認識。

二、研究目的與貢獻

本省人與外省人在學理上不是分析概念，而是在歷史過程中實際操作分類的生活概念，是歷史過程中的政治建構，蔓延至日常生活。人雖然是建構歷史的產物，自己其實也是歷史中的產物。本研究目的在此要特別強調文章中針對的外省人並非指台灣社會大眾所認知西元 1945 年國民政府來台的外省老兵，而是指因韓戰成爲俘虜在西元 1954 年較晚來台的抗美援朝外省老兵。崔爺爺是在西元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123 自由日時，14000 人反共義士來台的其中之一士兵，他的生命經驗不僅是個人的故事，同時也反映出人們在不同時空背景脈絡之下集體的記憶。如同 Paul Connerton 在《社會如何被記憶》一書提到「歷史重構的實踐可以在主要方面從社會群體的記憶獲得指導性動力，也可以顯著的塑造他們的記憶。」因此，這篇文章可以從崔爺爺的生命敘說帶我們看見歷史的演變，以及一位 18 歲的男孩爲何當初會離家背景爲國參軍、參軍之後身爲俘虜爲何選擇來台、因韓戰來台的外省身分在台灣的生活處境、在過程中身分轉化對自我和家與家鄉的認同又是如何建構與呈現。

此研究的貢獻想表示現在隨著時間改變，台灣的外省人口逐漸減少，外省人裡反共義士、抗美援朝的人口更爲稀少，在社會上已經被視爲邊緣裡的邊緣少數人，目前這群人似乎沒有受到政策上真正的正視及族群的關懷與陪伴，筆者希望能夠藉由此研究能讓更多人看見在台灣世代的產物經過互相碰撞之下所產出的人生經驗，並且透過他人的生命經驗引領我們思考並理解自己以外的人們在日常生活的反應、想法和塑造這些反應與想法的歷史脈絡和情境，使我們有更開闊的多元文化視野認識他人，並且在我們的思維、言行舉止能更謹慎、體會、包容與同理心。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是以家、過去記憶的角度來討論抗美援朝外省第一代的老兵之認同問題。抗美援朝外省第一代的老兵的記憶是多重多義的，因爲受到政治歷史變遷及國家決策的影響，使韓戰來台的外省老兵們過去記憶大部分牽涉到中國與台灣的經驗，

這樣橫跨兩地的經驗也創造出兩個家的記憶。因此，認同上也會有中國與台灣兩個層次，這正是本研究想深入探究的核心。

一、什麼是「認同」？

Castells (夏鑄九 & 黃麗玲譯，2002) 在他認同的力量一書中對認同提出看法，他認爲認同是人們意義與經驗的來源，對於特定的個人與群體而言，可能有多重的認同，認同所建立出來的是意義，而角色建立出來的是功能。若以社會學的觀點來看，認同其實都是被建構出來的，這樣的建構是透過許多因素互相影響，包括歷史、地理、生物、生產與再生產的制度、集體記憶及個人的幻想以及權力機器及宗教啓示等各方面。Woodward (林文琪譯，2006) 指出認同是透過差異的標示而打造出來的，認同取決於差異。認同與差異是二元對立的，常以「我們」與「他們」這種二分法爲基礎，將自己與別人劃清界線，並且是在某個時間點上及時被生產出來的，因此，認同是一種流動的的出現。另外，Woodward 也提出過往的尋回是認同建構過程的一部分，人們都是透過認識過去、理解現在並且創造未來，這樣環環相扣的關係也說明了認同並非本質論而是不斷持續地再建構與修正。它的建構既是象徵的，也是社會的。Stuart Hall (1990) 在他文化認同與族意離散文章裡強調認同並不像我們所認爲的顯而易見或毫無疑問。應該要把認同是爲一種「生產」，它永不完結，且永遠處於過程的內部之中，而非外部構成的再現。換句話說，認同是不斷地在過程中更新，永遠沒有終點或停止。

不論是 Castells、Woodward 與 Stuart Hall 對認同的看法皆是認爲認同是流動的，不斷在過程中改變。認同並不是單一面向而是有多重再現的可能。而認同所要真正面對的課題正是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探究認同是什麼、從哪裡來、由誰建構、如何建構以及爲什麼建構。

二、 族群與族群認同

台灣是一塊豐富的多元文化族群寶島，在這塊土地上經歷過不同族群及文化洗禮，此研究探討的族群是以外省人爲始點來論述族群與族群認同的關係。

王甫昌(2003)提過「族群」這個詞彙是在 1950-1960 年代開始出現，過去都是做爲種族或或民族的區分。張茂桂(1999)也指出「族群是指一群因爲擁有共同的來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語言，而自認爲、或者是被其他人認爲，構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人」。若以上述學者界定族群的概念來說，族群的概念可以分爲兩種類別，一種是指族群有一些明顯特徵或是與其他群體有清楚差異的特質；另一種則是將族群視爲較主觀或可以獲得其他人的認可的構成。如果按照以上的定義來看的話，可以看見族群將分爲「我群」與「他群」的標準，因此，王甫昌(2003)提出族群是相對性的群體認同，比如說，所謂本省人的類屬是相對於外省人的隸屬；原住民則是相對於漢人。人們的認同往往是建立在差異，進而證明我群和他群之間的不同。在面對此現象時，隨著被放置的位置不同，人們是以什麼標準來認定自己的族群並且劃分界線沒有一套的標準答案。舉例來說，在台灣所稱外省人的「外」在用字方面上也無意的傳達出外省人是台灣的外來者，隨著歷史與國家政策的變遷也讓台灣這塊土地上有來自各地不同族群先來後到的人們。在蕭阿勤(2012)的重構台灣一書也指出政治鬥爭則常常是讓族群性蛻變成民族性的催化劑。處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下所面臨族群的關係有時不是自己能掌控或選擇的。談到外省人對於台灣族群認同的部分可以看見高格孚(2004)的論述當中發現一個表象的矛盾，很多外省人認爲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同時卻又認爲，身爲一個外省人，使他們有一個不同於台灣人的感覺。外省人來台的處境也明顯地在台灣族群之間認同的關係下不斷地面臨邊界的挑戰。

三、離散經驗

「離散」帶有遠離的意思。在李有成、張錦忠的論述當中指出離散之所以爲離散是因爲存在著兩個「中心」。一個是離散的始源，包括了家園、部族、國家或國族國家等。另一個則是居留地，也就是離散社群賴以依附並形成網絡的地方。離散介於這兩個「中心」，擺盪在柯立佛所說的「根」（roots）與「路」（routes）之間——「根」屬於家國，屬於過去與記憶，屬於有朝一日可望回歸的地方；「路」則屬於居留地，屬於未來，導向未知。在「根」與「路」之間，離散不時與上述兩個「中心」對話。在此，想藉由離散經驗的理論來理解因韓戰來台外省老兵的處境，透過離散經驗與流亡進而表達出對根與路的認同。進一步探討生活在這種因戰爭迫害而被迫離開祖國的回鄉之旅是一種漫長的路程，其中的複雜性包括中國與台灣兩地在歷史、經濟、政治、社會及心理一直以來曖昧不清的關係與狀態。在這過程中，我們可以看見流亡者如何從離散經驗裡所反映出不同的生存態度與展現跨文化的適應能力。此外，舉出 Stuart Hall 對離散經驗的看法，他認爲離散經驗不是由種族本質和純粹程度而定義，而是對必要的異質性並且承認多樣性存在所界定的，藉由包容差異，而非對藐視差異，這是一種經由差異與混雜性來定義認同的概念。由此可知，離散經驗是一種多元流動並無限創造的融合體，經由各種方式跨越時間、空間及文化，同時它也是一種再現的產物。

參、研究與訪談內容

本研究是在探究一位抗美援朝來台外省士兵對家與家鄉的認同與離散經驗，並以崔爺爺的生命敘說爲例。

崔爺爺在西元 1947 年 8 月 6 日正式參加八陸軍（現在稱爲中國人民解放軍），參軍的目的是爲了解除家庭與家人嚴重的被政治上的政策剝削。因此，想藉由參軍洗清家庭黑五類的罪名。

…我在 18 歲的時候志願參軍-中國人民解放軍，我們家屬於富農是黑五類的一個，為了讓我們家人不再背負這個黑五類的罪名，我決定參軍，參軍就是從軍，台灣說從軍，我們那邊說參軍。…(2014/6/1)

從爺爺在口述用字選詞的時候，可以看見台灣與中國大陸文化差異的不同。當時在文化革命前夕，中國的政治階級區分了紅五類與黑五類的階級分配，文革之後分類越來越明顯擴張，紅五類對政治身份分爲工人、農民、商人、學生、革命軍人等五類人的統稱，合稱工農商學兵；黑五類則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等五類人的統稱，合稱地富反壞右，與紅五類相對比。這樣的分類導致當時社會嚴重的階級鬥爭與歧視。爺爺的家庭當時因爲是富農的身份，所以家裡門口掛上黑燈，但在爺爺決定參軍之後，家裡門前的燈從黑燈轉換爲紅燈，家裡受到的國家政策待遇與名聲瞬間因此而改變。

參軍之後，崔爺爺一共參與了五場戰役，第一戰在西元 1948 年 9 月 16 日夜間攻打濟南，經過八天的戰鬥最後戰勝。濟南戰役獲勝三天後，因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兼代政治委員粟裕向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提議，希望乘勝攻殲淮陰、淮安、寶應、高郵、海州國軍之戰役，稱爲淮海戰役。爺爺參與淮海戰役戰勝之後，一直停留在上海待命。同時，在西元 1949 年中華國民政府在內戰中失敗撤退到台灣，聲稱仍爲中國政府，並希望早日反攻復國、收復失土。

…我經過許多戰役都是勝利而且很平安，我打過的戰役有五個，第一個是攻打濟南，八天的戰役最後勝利。接著參加淮海戰役打了很多戰都是勝戰，最後我就在上海休整。在內戰對抗擊退國民政府之後，共產黨文化宣傳很厲害，他們宣傳準備解放台灣，他們不說攻打台灣，因為他們說〝打〞感覺不文明…(2014/6/1)

在爺爺的戰爭經驗當中反應出國共內戰政黨與政治上的衝突在當時是平凡無奇的。原先共產黨準備將目標與動線轉向解放台灣，但韓戰在西元 1950 年 6 月 25 日爆發後，爺爺在西元 1951 年 4 月代表抗美援朝的中共軍隊參與其中，這場原是韓國南北之間的戰爭，爾後美國與中國分別支援南北韓雙方。由於韓戰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其背後卻隱藏著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爭奪地盤而開攻，當時多個國家不同程度地捲入這場戰爭。雙方勢力的對抗與灌輸的意識形態也使得站在第一線的軍人形成對立，各自爲自己隸屬的黨派衝鋒陷陣對抗彼此。

…在我第五次戰役中是去支援北韓對抗南韓，我後來因為受了嚴重的傷，遇到美國人被他們當俘虜，我以為我要死在那，我原本好緊張美國人揹我不知道要去哪，後來才知道美國人把我送去俘虜營裡的紅十字軍醫治療，我印象深刻美國人最後對我比個天主教的祈禱手勢就離開，這也就是後來我到台灣信天主教的原因。之後，我認識了一個貴人，一個翻譯官，他說我幸運遇到美國人，如果是南韓人就沒命了。他還幫我安排一個管理倉庫的職位，我在南韓的濟州島裡有個俘虜營當俘虜當了三年…(2014/6/1)

根據爺爺的談話中，透露出美國雖然支援南韓軍隊攻打北韓，但美國人與南韓人對於人權有不同的道德倫理標準，美國人與南韓人相較之下，比較講究人權方面的事情，戰爭和人權區分的很清楚。另外的層面是身爲一位俘虜的身份，使爺爺經歷過所有勝利戰役過程中的優越感與成就感就此瓦解。而在戰亂時期，宗教層面卻給人們在無歸屬感時產生想像的共同體，讓不同的族群跨越語言與社會角色的隔閡，進而形成連結性的認同感。

韓戰從西元 1950 年 6 月 25 日開戰至 1953 年 7 月 27 日簽署停戰協定，共三年之久，有些戰俘想回到中國大陸去，但卻無法回到自己的家鄉，必須流亡到大陸有工程的地方做工，因爲在共產國家所灌輸的觀念是寧死也不能成爲俘虜。

在韓戰尾聲時，韓國釜山戰俘營有 1 萬 4 千 2 百餘名華藉反共戰俘上書，請求釋放，並准其來台參加國軍行列，最後在 1954 年 1 月 23 日 14850 名中國反共願意來台的戰俘入境。入境台灣來之後被稱爲「反共義士」，這些反共戰俘來到台灣之後，都被編入中華民國國軍。台灣的軍事戰地位置很好，美國可以利用台灣牽制共產國家，當時台灣在政治、經濟與軍事方面都因韓戰爆發後受到美軍的援助。

…我在戰俘營待了快三年，為了爭取自由，我選擇到台灣。終於在 1954 年 1 月 23 日回台灣，受到了各界的歡迎，得到了國民政府的關懷與優待，這就是一二三自由日的由來…(2014/6/1)

由上述可見爺爺使用「回」台灣這個字詞，也顯現出他在現階段口述的過程中對台灣已經視爲家的認同，台灣對於流亡的外省老兵們也已成爲一條通往現在與未來的路，而代表根的中國家鄉則是屬於過去與記憶，也是一個希望有天能回歸的地方。

這樣的離散經驗更顯現出外省老兵對於台灣與中國產生錯亂複雜的情感與認同。

談到爺爺爲了自由所付出的代價時，他將胸膛、背部與手臂露出可清晰看見身上的刺青，左手臂是反共抗俄四個字，右手臂是消滅共匪，因爲解嚴時要回山東老家，因此兩邊手臂已經消除刺青，現今變成凹凸不平永遠烙印在身上的疤痕。而前胸膛刺的是還我河山，背後是和岳飛一樣的精忠報國依舊清晰可見。

…我在大陸參軍的時候認同的是共產黨。但在韓國當俘虜之後，到了戰俘營裡面喊一個口號「不自由，毋寧死！」所以我選擇來台灣，我在左手臂上刺上反共抗俄，右手臂刺上是消滅共匪，以表達我們反共回台的決心…(2014/7/31)

在爺爺身上可以看見歷史與政治變遷時所留下的符號，將認同分爲二元對立的情況下，這些符號與圖騰都是爲了證明自己的忠誠與政治立場。由此可見，外省老兵當下所面臨的處境與採取的選擇迫使老兵們爲了表示認同，使得身體外表與心靈內在上都有極大的衝突與轉變。

經過被俘虜的歷程及選擇來台之後，在身份與認同之下有極大的轉換，原先身爲反共義士的解放軍瞬間轉變成中華民國國軍，在台灣受到國民政府的保護傘下，對於自己原有的身份成爲不能說的秘密。

…我來台還是當軍人，那時候蔣介石宣導的口號是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四年成功五年全國統一。我到台灣的第一站是桃園楊梅，開始受訓，隨後被調派的順序是花蓮防校、台北南港、基隆、馬祖、嘉義、高雄、礁溪和鳳林，從輔導志願從軍到國軍空軍防砲部隊總共服役五年。之後，奉令退伍就成了中華民國的榮譽國民。…(2014/6/8)

在 1949 年時有個口號「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四年成功五年全國統一」，此口號帶給因戰爭流亡他鄉的外省老兵回鄉的信念，一喊就是十多年，不論成功的機會多渺小，這個希望與信念多少都能紓解在異地的鄉愁。這份信念也影響爺爺當初選擇來台灣的其中之一因素，期盼有朝一日能夠再踏入自己熟悉的土地和家鄉與老母親相聚。

台灣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各方面在當時皆不太穩定，因此，蔣經國先生提出克難運動安定軍心，使得一般官兵建立起信心。在軍中生活裡，爺爺談到在台灣當五年軍人的感受是缺乏安全感並且時常被監視，放假時不太想出去軍營以免怕被誤認爲匪諜，於是就利用晚上空暇時間看書，準備考教職人員。

…退伍後，我順利經過輔導就學到花蓮師範特訓讀書兩年，當時帶領我們的校長是李昇，他是李安導演的父親。特訓完之後，我們大部分老兵被分發到各國小任教，我算順利的，畢業後就被分發到花蓮縣玉里鎮春日國小開始任教。可是我有些朋友們才剛到花蓮某些學校，校長不分發，開學沒有當老師，之後就回來師範學校待命。的確有些校長不歡迎啊！因為我們講話還有些腔調，口音也不對頭，又看當兵的嘛！所以大家都叫我們阿兵哥老師。…（2014/7/15）

從 1951 年 7 月 10 日執政者開始改革與宣導，教育廳令各級學校應以國語教學，嚴禁方言，所有教師和學生之間都必須用國語談話，這樣的單語主義推動也間接造成台灣族群之間的隔閡。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人們可以口音和腔調猜測對方是從哪裡來或是哪一族群，透過語言我們可以看見彼此的差異性與相同性，同時藉由劃分出我們／你們／他們的概念尋求對自我與他者的認同，認同除了自覺以外也來自於他者的看法，雖然爺爺的社會位置從一位外省老兵轉變成國小教師，但仍然還是被稱爲「阿兵哥老師」，由此可以看見認同更是在互動社會過程中逐漸形成的。

單身的爺爺被分發到春日國小任教不久後，偶爾會與師範同期同學一起聚會，在互相交流時，得知有些人開始在台灣成家立業，但有些在與本省異性交往的過程中或婚姻，因省籍的差異導致不太順遂。過了幾年，爺爺在春日的某間飯館時常巧遇外婆一家人用餐，起初只得知外婆的父親是一位當地很熱情的里長，後來因爲一些因緣際會與外婆相遇了。

…我在春日任教時，透過朋友介紹，認識了莊〇〇女士，她的父母親待我如子，後來我與她結婚後生育了四女一男，共組家庭。我感謝她幫我很多忙，剛解嚴開放探親的時候，我因為是軍公教身份不能立即返回我的家鄉，是她先代替我回去探親。我後來在民國 78 年第一次回家完成我見娘一面的終生心願。…(2014/6/8)

在爺爺描述自己當上老師的歷程時，教師職位的社會地位似乎無形之中掩蓋爺爺以前從軍身心錯亂的經歷，這樣的認同包含了對自己的觀感，這種觀感涉及到意識和無意識的思維與情感。除了在工作的轉變上有產生新的認同，與太太共組家庭方面也讓離散經驗的自己在台灣創造出自我心靈上的寄託、安穩與對家的認同感。而在解嚴時期，返回家鄉的過程中也歷經了等待與煎熬的考驗。當爺爺敘說自己與娘重逢的片段時，邊敘說也邊落下淚水。

…我自從離開家之後，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再見我娘一面，解嚴後，我回到家鄉時，發現自己在中國大陸的身份已成為喪命的烈士，親戚都不敢相信我是真的崔家桂(中國大陸名字)，直到我家人認出我的字跡與比對我述說我的兒時記憶時，大家才真的相信我回來了。聽到我堂哥和我說每年過年娘都會在黃河大堤邊呼喊我的名字，叫我趕快回家，娘很念著我，不相

信我真的已成烈士。有時天氣好時，也會到河堤邊尋找我的背影，娘從來不覺得我成了烈士死去了。…(2014/6/8)

從以上描述當中，讓我們發現歷史從來就不是建構於過去的現實之上，而是建構在我們對過去的選擇與詮釋。當自己使用特定的文化、故事、語言與集體記憶標示自己是誰時，其實也在尋找自己的認同。爺爺在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名字是不相同的，爲了身份的轉換，在名字上也脫胎換骨，保護自己在台灣的人權，這樣的認同與改變也標示給別人看見自己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認同及作爲。由此可見，台灣與中國政治上的轉換及操弄使得許多相同處境的老兵都有類似的情形與經驗。

…在此我要感謝兩位偉大的人物，就是台灣的總統將經國先生與中國的鄧小平主席，如果沒有這兩位，我們這些老兵是無法回家探親的…(2014/7/15)

經過許多政策與國家的協商之後，沒有決定權與自主權的外省老兵能終於能在回家探親找尋自己渴望的親情，當經過幾十年再次回到自己的家鄉時，看見的不只是自己熟悉的家鄉，同時也看見時間在這段時間形塑出的陌生感，因爲時間與空間所產生出的差異也對一位流亡在異鄉的外省老兵展現出超越二元對立結構的複雜性，而同與異的界線在不同的地點、時間和不同問題的關係上已重新設定。

…我在台灣生活已經習慣了，這邊有家庭兒女與太太，還有一份穩定的教職工作，這樣的生活方式我覺得很好。而且中國的老家每一年我都一定會回去一兩個月探親。你們要記得當我離開人世時，你們要幫我處理好，我要回去中國和爹娘埋葬在一起。…(2014/6/9)

在爺爺回家鄉尋根探親之後，不少中國大陸的親戚希望爺爺回歸家鄉一起生活，然而這趟回歸起點的旅程就像一個想像的國度，它隨著時間與空間的流動，既不會被實現、也無法得到回報，因爲於它只是象徵和再現的開端。最後爺爺希望能夠繼續在台灣生活，但離開人間時想要回到原本最初的家鄉，這個過程的結果也顯現出對兩種認同想望之間從矛盾與拉扯轉爲共存與和諧。

肆、結論

對於抗美援朝來台外省士兵的處境，在我透過理解爺爺的生命經驗後，非常佩服相同處境的士兵，隨著歷史脈絡變遷下不斷遷移，在環境給予交錯複雜的挑戰下，不斷地調整及順應這個社會、制度與規範。同時，也看見一個外省人對於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認同是無法以二元對立區分的。在反覆不斷建構自我與對家的認同過程之中也看見政治決策在一個人身上留下的歲月印記與心理上的衝突與矛盾。若我們能對相同處境的人多一份理解，在台灣族群之間的衝突能更建立在較有情與理之上。

從爺爺的生命敘說裡我們看見一群人民的集體記憶與歷史的天使。集體記憶也包含個人的經驗與記憶，而每一次的敘說都伴隨著記憶或遺忘，所以每次的述說是在創造新的再現，認同也因此飄忽不定。歷史的天使有兩面，背面是風暴帶來的殘骸與廢墟，正面則是象徵光明的進步，有時當我們想往前走時必須要回顧過去才能看見通往未來的道路，因此，現在的我對於爺爺不僅有重新的理解與同理，也希望往後若能持續進行此研究並且邁向深入訪談，進一步清晰地將爺爺的生命敘說放在歷史脈絡下不斷來回的對話，將資料的信效度更具有說服力。

參考文獻

Castells, M. (2002). 導言; 第一章, 認同的力量 (夏鑄九&黃麗玲等, Trans.) 頁1-77. 台北: 唐山

Hall, S.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culture, difference (pp. 222-237).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Woodward, K. (2006). 認同與差異(林文祺, Trans.) 頁13-110. 台北市：韋伯。

王甫昌（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市：群學。

李有成、張錦忠（2010）。離散與家國想像 ： 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台北市：允晨文化。

施正鋒（2000）。臺灣人的民族認同。台北市：前衛。

高格孚（2004）。風和日暖: 外省人與國家認同轉變。台北市：允晨文化

張淑雅（2011）。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新北市：衛城出版。

蕭阿勤（2012）。重構台灣 ： 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 聯經。

【回首頁】

中國結？台灣結？

一個芋頭＋番薯家庭的家國認同與生命經驗

本文作者：樓昕，
目前為東華大學多元所碩士班學生。

一、序言

我從小在被稱之爲「折衷家庭」的環境成長，家中除了父母及弟弟外，還有祖母陪伴。因爲祖母使用「國語」，也就是「北京話」作爲溝通語言，而不會其他語言，因此我從小到大都與她說國語，並稱呼她爲「奶奶」。

當時，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年農曆過年。每年只要年近尾聲，奶奶便要母親四處採買，製作家中每年都要吃的一道年菜：什／十錦菜。顧名思義，這道菜需要齊聚十種不同的食材，並且翻炒接近整天的時間才能完成。看著每年都爲了什錦菜忙著在全臺中各處市場採買的父親，又看著每年都爲了炒什錦菜而花上整天的母親，我心中其實是充滿許多疑惑的。我曾經問奶奶：爲什麼，我們一定要準備什錦菜呢？每次聽到這個問題，奶奶總是笑著回答：那是我們外省人的傳統，過年一定要吃什錦菜，才能十全十美，迎接新年。

可是，農曆過年對我而言，又有另一件一定要做的事，就是在初二的時候，我會到中央山脈的另一側過年，會回花蓮外婆家過年。

相較於只會使用國語的奶奶，外婆反而只會使用閩南語，因此我都稱呼她爲「阿嬤」。在我的印象中，阿嬤從來不會煮什錦菜，可是阿嬤每年過年都要辦桌。我們就邊坐在家門口吃飯，邊看著家旁邊的廟宇每年歡慶的「天公生」，以及每年都會請來的歌仔戲團，唱著我聽不懂的戲曲。

而我，曾經以爲每個家庭都跟我一樣，家裡面有著「奶奶」，也有「阿嬤」；有著「臺中」的家，也有著「花蓮」的家，然後，我們都有著一個遠遠的家，叫做「中國大陸」。

１、父親篇：不是「建民」，而是「元曙」

奶奶出生於江蘇名門望族，因爲嫁給投筆從戎，對日抗戰的爺爺，因此與家中成員斷了聯繫。後來又因爲身爲軍官的爺爺參與國共內戰，戰敗逃難至臺灣，原本以爲很快就能在臺灣重振旗鼓，反攻大陸，沒想到這一住，便是七十餘年。來到臺灣後，爺爺並未因爲軍官的身分而享有任何特別待遇，甚至因爲政府安置失當，還失去了軍官的身分；而奶奶在嫁給爺爺前也沒有任何的工作經驗，因此排行第四的父親出生時家境清寒，一貧如洗，與刻板印象裡對於外省人都是政治要角，地位崇高的想像完全不同。而父親出生的前一年，正好是臺灣簽下「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那一年，爺爺感受到兩岸局勢緊張，可是國民政府卻遲遲未有直接且有力的反擊，看來反共之路遙遙無期，因此將元旦清晨出生的父親命名爲「元曙」，而非延續兩位伯父的姓名。（兩位伯父名爲「建中」與「建華」，由來爲「建立中華民國」。）

而相較於姑姑及伯父們積極向上，考進臺灣大學並出國留學，父親的求學階段正好是爺爺重病臥床，無法工作的時間，因此常常與父親提起過去在大陸生活的點點滴滴，因此父親開始受到未曾見聞的故鄉呼喚，放棄新聞系而改走歷史系，希望透過鑽研歷史，了解那段他不曾參與的過去，也了解那個他不曾居住的環境。在大學求學的時間裡，父親也曾經大量接受社會學及其他人文學科提供的知識，也曾經對於國民政府對於本省人的壓迫感到不滿，可是，當父親試圖想要投入當時各種運動的改革風潮時，卻發現始終無法擺脫外人貼上的「外省第二代」的標籤。因此畢業後，父親報考了當時某公家機關的約聘人員，原本希望透過進入體制，透過逐年升遷，改變這個社會對於非外省族群的臺灣人的不公平。可惜因爲某些理由，該單位與其他單位整併，原本的員工工作均將做調整，父親評估後覺得自己的工作可能將會被裁併，因此決定提早退休。

退休後，因爲曾經去大陸旅遊觀光，又在臺灣本土發現不少文化傳承及交流的部分，父親認爲，要讓外省及本省兩種族群開始對話甚至和解，或許透過討論彼此廟宇的建築設計，看見彼此的異同，是個全新的開始。加上父親曾經受過的歷史學訓練，正好能對此一議題作完整的發揮。因此，父親選擇領隊導遊作爲自己的第二份事業。記得父親曾說，透過擔任領隊，他開始頻繁的踏上並了解大陸那片陌生卻又魂牽夢縈的故鄉，也開始重新認識臺灣這個自己從小長大居住在此的家鄉。

2、母親篇：客家庄中的閩南人？閩南村中的客家人？

母親的故事意外的與父親有某些相似之處：阿嬤也是原本宜蘭一名員外的掌上明珠，認識阿公後經商失敗，只好搬至花蓮，試圖在花蓮找尋一片新的天地。不料經商失敗後，連投入農務工作都慘遭天災侵擾，家道中落。排行第六的母親因爲想要逃離貧困的家庭，因此選擇師範大學，試圖透過成爲教師作爲階級翻身的方式，建立屬於自己的家庭。

有趣的是，據父親考察的結果，母親原本生長的地方爲一客家村，而母親自己則是堅持她從小是生長在閩南人的聚落，無論真相爲何，母親使用的母語是閩南語，也堅信自己是閩南人。另一件與母親的族群認同有關的故事，則是母親從小念書時剛好遇上國民政府推動「講國語政策」，禁止使用閩南語，因此家中大多數成員均排斥外省族群，認爲他們霸道無理。可是母親卻因爲考上師範大學的國文系，鑽研中國古文後，成了全家人少數幾個接受外省族群的存在。也因爲如此，母親才會接受朋友推薦，與外省第二代的父親結識，而後結婚，生下我與弟弟兩人。

3、兒子篇：臺灣人？中國人？浙江人？臺中人？

相較於父母親「乾淨」的族群認同，我反而因爲夾在他們兩人之間，而對自己的認同感到困惑不已，以下以年齡順序列出四個小故事，作爲討論自己的切入方式。

故事一：

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身分跟別人不太一樣，是在小學低年級參加一場繪圖展覽。當時，基本資料欄上除了耳熟能詳的「姓名」、「性別」以及「出生年月日」外，赫然出現了陌生的兩個字：「籍貫」。我與導師兩個人愣在那裡：相較於我的「愣住」，是我不認識那兩個字，導師的「愣住」，或許是不知道該如何填寫吧？記得當時導師問我的，是「你爺爺是哪裡人？」我想起從小父親與奶奶的耳提面命，很快速的回答「爺爺是浙江人！」我雖然忘記導師那時的表情，不過那欄空白倒是很快速的被填上了「浙江」二字。結果，我一直都記得，當自己的圖畫在臺中市的文化中心展出時，數十幅的畫作下方的籍貫都寫著「臺中」，只有我一個人寫著那遙遠又陌生的「浙江」。

而這正好是在臺灣仍然使用籍貫作爲歸類人民方式時發生的故事；而後，臺灣於 1992 年開始修法，將戶口名簿及身分證上的資料欄取消籍貫，取代爲出生地。

故事二：

年紀稍大後，我漸漸發現原來我身邊周遭的人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著從大陸來的奶奶，也不是每個人都有著說閩南語的阿嬤。有些人的奶奶就是「阿嬤」，就是會講閩南語的奶奶；有些人則是反過來，有著從大陸來的「阿嬤」；當然，更有人的奶奶都是「奶奶」，或是「阿嬤」都是「阿嬤」。這個「發現」讓我開始了解，不是每個人自己及其家人都是與大陸有關，我習以爲常的世界也因此開始崩解，可是，因爲朝夕與奶奶相處，而與阿嬤只有每年寥寥可數的互動，因此，我仍然將國語作爲母語，並認爲這是唯一的語言。

有趣的是，也是當我離開了義務教育的階段，進入高中那一年，也就是 2001 年，教育部開始推動九年一貫課綱，鄉土語言正式進入義務教育課程的一環。閩南語、客家語以及原住民的語言從那一瞬間開始，終於不再是課程以外的學習，不再是片面的方言。

故事三：

升上國中後，剛好是杜正勝在國立編譯館推動「認識臺灣」歷史篇、地理篇與社會篇的時候，記得當時是國中一年級，在有正式編制的「認識臺灣」授課教師前，都是由導師負責授課。某次上課，課本內容提到四大族群的概念，導師爲求生活化，詢問班上同學分別隸屬於哪一個族群，記得班上有接近二分之一的閩南人，接近三分之二的外省人，三分之一的客家人，沒有人是原住民，然後，我忽然發現我沒有辦法舉手，因爲，我的父親是外省人，可是我的母親是閩南人啊！相較於同學能夠清楚劃分自己隸屬的族群，我忽然成了全班唯一一個沒有舉手，也沒有辦法舉手的人。記得導師當時對我非常不滿，覺得我爲什麼懶得舉手，可是，這也是我第一次發現，我，找不到自己的族群歸屬。

故事四：

而找不到自己的族群歸屬只是開始，而後國中二年級那年，剛好遇上了 2000 年第二次的總統大選。從那次選舉開始，我發現自己雙重的族群身分就像伊索寓言的蝙蝠一樣，支持泛藍的同學總是以我父親是外省人，所以一定要支持中華民國唯一正統

的政黨；反之，家中成員想投給泛綠的同學則是提醒我母親是講閩南語的，捍衛臺灣主權，支持臺灣獨立才是王道。當時，對於政治處在懵懂階段的我只能透過如此簡單二分的方式看著臺灣，感到困惑的是，我們不都是臺灣人嗎？要選出的，不是願意爲臺灣付出的政治人物嗎？爲什麼，要去區分中華民國與臺灣呢？爲什麼，要去區分藍綠呢？爲什麼，要去區分我是哪裡人，我是什麼人呢？

而從那次選舉後，我發現每一次的選舉，無論是市長或是總統大選，我都開始面臨一樣的處境，而我雙重的身分持續的被同學拿來做爲操弄，作爲鼓吹、遊說、甚至反對、排擠我的理由。

二、過渡期

2004 年，第三次總統大選，那年，我高中三年級。當時，兩顆子彈劃過總統候選人的身體，也劃過每一個臺灣人的心。我們班原本是該屆感情最爲融洽，不分彼此的班級，卻也在那兩顆子彈劃過後，被切割成了兩半。當時，我們高中的英文老師出了一題英文作文，將臺灣政治互相切割的亂象以及自己的期待作爲題目，要我們寫下自己的心得。當時，我終於忍不住心中的無奈，將自己被切割的感受洋洋灑灑寫了整整兩頁的 A4。沒想到老師看完讚嘆不已，居然將整篇文章作爲全校英文作文的範本，要全校學生效法學習。老師確實立意良好，試圖將我的「文筆」作爲範例，可是同學接收到的訊息，卻是樓昕對於切割的憤怒，對於自己身爲雙重身分的無奈，以及希望大家放下仇恨敵對的期待。若是平日，或許那篇文章就會這樣船過水無痕，可是，那兩聲槍響，卻讓分別支持藍綠的同學將我視爲另一方派來的打手，專爲另一方找藉口開脫。本來就被升學壓得喘不過氣的同學們在此時有了更好的理由能夠宣洩，我在學校再一次的被排擠，甚至，連原本要好的朋友們都因爲心痛陳水扁的傷勢，而覺得我真的就是高級外省人，高高在上談著不可能的大和解。

也因爲這樣的被排擠，原本就想報考心理學系的我決定遠走高飛，選擇放棄學校幫我安排的法律系推甄，改而申請離家遙遠，卻又位於自己另一個家的國立東華大學臨床與諮商心理學系。當時的自己之所以放棄法律系，除了想要逃避學校的安排外，其實另一個重要的理由，是看見當時社會政局的混亂，不希望自己被捲進其中；而選擇心理系，除了是過去的助人經驗引領自己做出這個決定外，同時，自己也其實是想透過心理學知識的掌握，重新理解很多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進入心理系後，我曾經與系上教授一同與在地的小學接洽，爲偏鄉兒童進行課輔以及認輔。因爲童年在花蓮生長的經驗，因此對於花蓮的交通我有著一定的了解；加上母親曾經是花蓮人，透過與教過母親的教師或是母親剛當上教師，在花蓮任教時認識的同事接洽，我開始爲系上及自己找到許多可以合作以及付出的機會。這些對於花蓮的認識在此時此刻變成了我的資源，變成了我知道該怎麼爲花蓮付出的方向。

此外，我也曾經在一門通識課上認識一位在推動社區營造的教授。在與他走入志學村以及鯉魚潭附近的池南村後，我開始發現，自己將之視爲生活機能的志學村，原來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問題：例如鄰近的志學國小，便因爲同時存在教授子女以及農村子弟而有著巨大的斷層，資源過度集中在特定一端而沒有開放給全部學生使用。而池南村也因爲年輕人出外尋找工作，留下的都只有老人及小孩。過去在社會或歷史課本上才會看到的句子忽然成了血淋淋的現實，等著我去面對，思考，並找出「治癒」之路。

而當年，正好是陳水扁政府開始大力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時候，隨著與教授訪談，規劃並執行活動，甚至，參與在地居民自己舉辦的活動。我開始發現，東華大學校歌所唱的「我們不是過客，是這裡的主人」中的「主人」二字，或許並不是一種「擁有主權的人」，而是一種「能夠給出的人」。

而後，我認識了身爲客家人的鑠崴，她身爲原住民學院學生的身分讓我開始瞭解，原來，臺灣不只是過去同學討論時的簡單，臺灣並不只是外省人反攻大陸的基地，也不只是閩南人霸佔的天堂，臺灣同時是客家人生活的地方，更是原住民一開始的家。

於是，正如好萊塢於 2005 年推出的動作電影「蝙蝠俠：開戰時刻」裡所說的，我開始覺得：「我是誰並不重要，我的所作所爲才是最重要的。」我究竟是什麼人，是哪裡人，都不是重要的事，重要的，是我能爲這片土地做些什麼。

三、改變的開始

出社會工作後，因爲一些因緣際會，我進入了多元文化教育碩士班繼續進修。一年級必修課，「多元文化教育導論」的課程裡，廉兮老師的一句話，徹底地將我從過去的想像拯救出來：她說，多元文化教育裡談族群，並不是像族群文化學系使用人類

學的觀點，將族群視爲博物館裡恆常不變的概念，而是將族群視爲一種流動的，不斷改變的過程。因此，沒有純粹的「OO 人」，因爲每一個族群，每一個個體，都在改變之中。

而今年，2014 年，3 月 18 日學生佔領國會，發動太陽花學運後，面對身邊周遭又有些同學及朋友用過去的切割方式，嘲笑我是外省人，趕快在這個時候支持服貿，兩岸就可以統一，我就可以回家，我發現我不再無所適從，我不再像過去想逃避至花蓮一樣，將這一切的衝突兩難與我切割，而是光明正大的與對方說，我就是臺灣人，我就是生長在臺中，同時受花蓮影響很深的臺灣人。我要捍衛的，是臺灣的人民。因爲，這裡，是我的家。

四、小結

因此，正如我面對太陽花學運的態度一樣，我相信過去的臺灣受到中國影響，我也相信過去的臺灣上面有原住民在努力；我認同父親想看見他父母生長環境的鄉愁，我也認同母親對於花蓮的眷戀；我知道臺灣與中國有其關係，可是我也知道臺灣已經不再是中國的一部份，而是一塊需要我們呵護照顧捍衛的土地。

於是，我現在生活在中央山脈東邊，我不只是堂堂東華人，也是堂堂花蓮人。

同時，我不只是堂堂花蓮人，也是堂堂臺灣人。

【回首頁】

校友回娘家（2014/09/14）

校友王聖元回娘家的分享與座談，現場座無虛席。

【回首頁】

新生入學指導（2014/09/14）

由劉唯玉主任主持的新生入學指導，師生互動相見歡。

系所動態

【回首頁】

103 級教育碩士班新生座談會（2014/09/18）

【回首頁】

多元所&科教所師生座談會（2014/09/18）

【回首頁】

103 學年度教育博士班師生座談會（2014/09/19）

【回首頁】

兩岸雙華教育論壇學術交流 （2014/07/03-07）

～活動剪影～

論文交流發表

論文交流發表

致贈紀念品

兩岸教授交流

會後合影

學術活動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學院大樓前合影

清華大學校園內合影留念

《人物專訪》—蘇羿如：一段走唱的學習歷程回顧

本文作者：蘇羿如，
畢業於國立東華大學多元所博士班，
目前為東華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想望

對於一個從小生長在花蓮的小孩而言，在國中、高中時期每當聽見到他鄉求學的學長姐回來過年過節，都會心羨不已。遙想一個美麗的憧憬，負笈北上，體驗都市的生活型態，對於生長在後山的小孩，大自然像是自家的後花園，每天看著也就覺得稀鬆平常，反倒是從未曾到過的大都會，電視廣告中呈現的各種城市意象，逐漸地孵養了我們朝向光鮮亮麗與便捷高貴的都市夢想，印象最深刻地莫過於當第一家麥當勞在花蓮市中心矗立起，還在讀高中的我終於期盼到家人的允許和贊助，和三五好友在麥當勞的聚會，外食這件事在我離開花蓮前是相當陌生的事，何況一份麥當勞套餐的費用，大概是一般家庭一餐的買菜費用，當時的我總納悶又欣羨台北人三餐都能吃麥當勞。在離開家鄉前，都市不僅代表著先進與繁榮，她更像個蘊藏驚喜的新樂園，訴說著大自然從未說過的事。猶記在花蓮女中的教室樓頂，眺望著太平洋，渴求的是大學生活的自由自在，儘管花蓮是一座悠適的城鎮，但總不敵想像中的繁華都會，外地是夢想的所在，火車乘載著的是一個個尋夢的孩子，所以那時候我對於火車有莫名的好感。

真的北上求學了，讀的是新聞，一個與社會現實相輔相成的科系，新聞人被譽為是報導社會現況的先鋒，是掌握第一手資料的守門人，某種程度也是社會議題的製造者。在這個學門裡，初聞守門者 gate-keeper 這個概念時，相當震撼著我，終於能為社會做些什麼了，當時我心想著。一種大學生淑世的熱誠，更是替自己在社會中找到安身立命的位置的篤定。社會責任應是這門學科責無旁貸使命，至少這樣的鴻鵠大志對於一個熱血方剛的我，有很深的自我期許作用。也不知道是幸抑或不幸，在我讀大學時，躬逢第四台蓬勃發展之際，電視媒體以即時效應之優勢，反而讓我的學習陷入了一種困頓狀態。才剛念大學一年級的第一個學期，我感覺所獲得的資訊量已經超過我成長十八年的總量。當時撥公共電話回家時，家人電話那頭講的大小事，和我離家時幾乎別無二樣，而我卻經歷著知道的訊息太多，不知如何是好的亂無頭緒狀態。所以經常只能電話簡單應付幾句，匆匆報完平安掛上電話又回到資訊爆炸的世界。而在那個個人電腦不甚普及，還在用書卡檢所書目的圖書館年代，資訊像鍍了金的知識，我分不清資訊、知識和學問有什麼差別，好像不管是什麼，比別人知道的越多越好，知道的越早越好，越新越好。

有趣且無奈的事，課堂上多了一分挖掘新聞的技巧，就少了一分自我反思的能力；採訪技術是多了一些純熟，但對於人的關懷卻逐漸隱沒。於是對於新聞的志節從課堂上逐步地移轉到了社團。加入社會服務團後，整個大學生活也一起風雲變色，很難想像，大一到大四的生活就這麼心甘情願、無怨無悔地賣給了社團，是認同紮了根還是致命的人情鎖縛著我，老實說，我至今仍釐不清。猶記當年同屆夥伴對我說過：「嘿！我們不過二十出頭的少年，為什麼背負了重麼沉重的壓力與責任」。是沉重啊，忙不完的社團的活動（小朋友的課業輔導、社區工作執行、義工活動的參與），開不完的會議（每週固定的幹部會議、各活動的行前協調會議、校外拓展關係的會、校內溝通檢討的會）。是責任啊，每年寒暑假到偏遠地區或部落的服務隊，是每學期薪火相傳的開始，從學長姊那接下代代相傳的種子後，責任就上了身，即使看著學弟妹同樣接下著傳承的棒子，走著前人指向的途徑時，傳承仍舊不是將肩上的責任卸下而已，更多的時候是責任轉換了形式，從過往社團的中堅，成為了徬徨時經驗的諮詢者、困頓時心靈的撫慰者。原來只是轉換了角色啊！轉換了角色隨之而來是另一種責任的形式，從主導社團運作轉變成亦步亦趨地在他們身旁關注著，心理的牽掛未曾一刻停歇。

突變

很快地，隨著時間的消逝，大學四年就這麼悄然地即將告一個段落，人生的另一個階段也即將在不久的未來展開，但我似乎還沒有任何的準備，來迎接一個我所未知的世界。就在升大四的那一年暑假，我充滿煎熬與不知所措，在課堂上新聞的專業訓練與課後服務人群的各項活動，雖然讓我的大學生活過得多采多姿，但總覺得少了些什麼，我有點茫然。然而，就在四上的一門「社會變遷」的課，似乎短暫地解答了我的疑惑。原來在實踐過程中背後是那樣巨大的暗潮洶湧的結構性力量。難怪會有這樣沉重的無力感，但在這些變遷過程中，前人是怎麼面對的呢？這些無以名狀的結構又是怎樣出現的？在這堂社會學入門的課程中，開啓了我對於社會的想像圖像，因此在大四這一年，我專心的準備研究所的考試，同年考取社會學研究所。

有幸進入社會學研究所就讀，是令人振奮的一件事，唸得是社會學理論組，求知若渴的我恨不得能一口飲進所有知識的甘泉，不過顯然唸書這件事，和我所想有著天壤之別，艱難的詞彙與高密度的文字意涵，讓我吃足了苦頭，原來書也可以這麼難唸。咬著牙，啃蝕著書本上的字句，我的生活逐漸由嘻嚷的人群轉回了獨自的一人。這段單純的讀書時光，有很多的時間是我自己一個人和堆的雜亂無章的書籍一起度過，生活簡化到只剩下回家、學校、以及吃飯的地方。離群索居成了唸研究所這段日子以來的寫照，脫離了人群意謂著多了沉澱自己的時刻，沉澱著曾經風光的大學生涯，也沉澱著書本中的世界與現實中的世界有著什麼樣不同的面貌，而在這過程中我對社會的認識是否逐漸明朗了呢？我不斷地探問著自己。到了要寫碩士論文時，理論

和現實世界像是彼此努力使用不同語言，在不斷重複講著同一件事，語言的轉譯經常帶來誤解的美麗與惆悵。就像是到了都市原住民空蕩簡陋的房舍中，看到 Ina 在剝野菜，跟我聊這個野菜是在這邊過去的那裡摘的，抓一些要我帶回去煮，至今這簡單的畫面，想起來時還是充滿溫度。但回到書桌前，寫出來的卻是社會結構下個人處境的行動策略等，諸如此類的學術語言。因此，內心偶爾會想著，若說轉譯所遭遇的矛盾或困頓正是達成理解的起步，那麼理解過程中會開展出什麼美麗的畫面是值得期待，不是嗎？倘若如此，如何將理解運動從個人層次，進一步擴展成關懷他人並達到更爲合情、合理的社會秩序，似乎也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實踐

在研究所畢業之後，我隨即回到故鄉花蓮，爲的是這片栽培我十幾年的土壤，我卻不曾好好了解它、關懷它。甚至我常在想若我要能往前邁進，那麼我得清楚地知道孕育自己養分的土壤栽種出怎麼樣的我。這是爲下一段的旅程，看清方向。回到花蓮後，我先進入慈濟基金會擔任社工員，深入各鄉鎮訪貧與提供協助。爾後又到東華大學從事教育部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劃—「東華的挑戰」-以科際整合、社會實踐爲理念提昇與整合通識教育課程計劃的研究助理。這是由當時東華大學副校長所領導的團隊計劃，共有六位來自不同學門的教授群協同主持，這些學門分別爲環境政策所、諮商與輔導學系、教育研究所、民族文化學系、運動與休閒學系。三年的研究助理生涯，除了對行政程序的駕輕就熟之外，最大的收穫莫過於人際關係互動的知悉與溝通技巧的純熟。因爲整體計劃的目標主要是朝向以「學生自主學習」及「社會場域」所建立的主軸，進行課程改革與整合。目的是爲了讓在學學生，在面對既存秩序的轉變，個人能具備自我省察、忍受的耐力、與穩定的信心。同時，也爲了學生個人要能夠細緻與統整地思考、在群體中與他人共同合作、以及進行具體行動策略的規畫並爲自己的未來尋求出路的可能，所以我主要的工作內容有很大部份是擔任協助學生完成屬於自我的量身計劃。

而在參與整合計劃之餘，我同時兼任國立空中大學花蓮學習指導中心社會科學系面授教師，由於空大的學生社會經歷已十分豐富，面對一群社會歷練遠勝於我的前輩坐在講台下聽講，每次上課內心總是誠惶誠恐地拿捏講課內容，希望能將自己在學校所學與她們的經驗彼此切磋。之後進入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博士班就讀，又是一次視野的開展。在理論與理論間、理論與實踐之間、實踐與理想之間，更是處處充滿張力與反思。有了對故鄉的認識，有了工作經驗，有了教學經驗，這些都讓我的博士生涯變得立體與可親。而知識與人生的實踐的並行，更讓我得以充分運用在博士論文的探究上。花蓮，這個地方除了多數人所熟知的優美的自然環境之外，事實上它的獨特更可以從人群與文化的雜揉而加以認識。在台灣原住民約有四十七萬人，僅佔台灣總人口數的 2%，然在花蓮縣的原住民、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的人數比例則幾乎是 1:1:1:1 的相近程度。換言之，在花蓮不僅擁有多數原住民的聚集，從而形成一個多族群共居之處，同時更突顯這個地區的族群互動的特殊現象。

事實上，對於台灣原住民課題的關注從我的碩士論文就已經萌芽，當時我主要探究的是都市原住民聚集/離散型態與族群意識之間的關係，而之所以會對都市原住民有所關注，主要是因爲對當時原鄉大量人口外流到都市討生活的現象有著深刻感觸，尤其他們在都市生活的種種處境，以及何以他們會形成居住和職業上的聚集和離散不同樣態，又這些差異樣態如何影響他們的族群意識等，是碩士階段我著力的探究之處。進入博士班之後，因爲能夠近距離地直接進入田野地，因此我將焦點放回返鄉都市原住民的探究，當時有幸跟隨指導教授王應棠老師的計畫案，探討返鄉原住民的處境與家的意義，同時亦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研討會。此外，參與秀林鄉誌(主要爲太魯閣族居住所在地)的大型整合編撰計畫，讓我更深入學習如何擺盪在族群理論與在地人的觀點之間，尋找一個適當的民族誌的寫作位置。

爾後適逢撒奇萊雅族的正名運動，我更以研究者與參與者的雙重身分，從正名運動到各項族群祭典的籌辦，完成我的博士論文，亦即嘗試以一種實驗式的民族誌寫作方式，探究與書寫撒奇萊雅族的生成歷程。其中所涉及到民族誌的轉向，乃至晚近批判民族誌寫作的興起與探究，皆是幫助我在理論的思辨、實際田野工作與如何書寫三者之間，進行深度的理解工作。簡言之，這對於身爲研究者和實際參與族群運動行動者的我而言，就是嘗試如何呈現(或再現)當代田野的一項珍貴訓練。在獲得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博士學位後，開始輾轉在幾所大學之間兼課，像是宜蘭大學的多元文化教育、東華大學的教育社會學，以及慈濟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婚姻與家庭等課程。之後有幸參與 2010 年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志工服務與生命轉化」整合型計畫，擔任博士後研究一職。又於 2013 年加入東華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團隊亦擔任博士後研究員，不論是教書經驗或是田野實務與研究書寫的經驗，對我而言，都像是在自我探尋的鏡像歷程一次次重看自己。

飛颺

在就讀博士班期間因獲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金，而前往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大學(Ottawa University)學習，當時我自己選擇了幾門課程旁聽，並利用課餘時間到當地原住民中心擔任義工，想實際了解當地的原住民情況。在自告奮勇滿腔熱血地寫了幾封信到當地的原住民中心後，音訊全無。於是我主動走進 Odawa Native Friendship Centre，進到這個中心時，也不知道要找誰，所幸

就趨步朝向迎面而來的那個人做起自我介紹，詢問她若想當義工要詢問誰。就這樣的因緣際會，我開始了每週固定二天的時間，到該原住民社區中心做義工，主要工作是和當地輟學的青少年和未婚懷孕的年輕媽媽互動，並服務當地原住民老人，時間共六個月，也因爲透過實際生活的互動，讓我得以了解加拿大原住民的生活處境與當地政府的關係，更重要地認識到一群對我照顧有加的朋友。而在這個被譽爲是原住民族群福利做的相當完善的國家，其實政府與原住民、土地、原住民政策等議題，其糾葛的愛恨情結一點也不輸台灣。

總得來說，回首自己一路上的學習歷程，若要我成長了什麼，很難一言道盡，比較像是邊走邊學邊唱，有時可以現學現賣，有時則必須要學了什麼就得抖落些什麼，有時像是想留下又不得不離開的一曲永恆鄉愁。學會反觀，應該是我截至目前爲止最大的收穫，抖落了一些不曾質疑的價值；抖落了一些自以爲是的主張。在發現身爲一個人的種種限制之餘，又深刻地體會到深爲一個人的種種可能性，不斷的反思是對自我的檢證，過程雖然是苦澀的，但對生命的體悟總是更爲難得。反思或許可以看成是海闊天空前的退一步，我想這是任何一個新的階段開始前，最好的一項禮物與準備。

【回首頁】

《深度書評》—Language, Culture, and Identity among Minority Students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Hui.

本文作者：張立之，
為國立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學生。

本書主要內容

本書於 2013 年出版，從教育哲學與社會教育學的觀點，探討中國兩位少數民族──回族──國小女學生的生命經驗，特別是這樣的生命經驗對於他們身份認同的建構所造成的影響，以及學校教育對於他們的意義。書中相當生動地描述了在中國一般的都市裡公立小學的場域中，回族的學生是如何建構他們的身分認同，並揭發了一般學校的課程、教師與家人，對於回族的孩子的身分認同的建構過程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與影響。本研究的重點在於探索影響回族孩子身分認同，以及他們對於自己語言文化所知極少的原因。最後，本書也對於學校教師、行政當局與決策者提出建議，指出應更加認識、欣賞少數文化，並將少數族群的文化與相關知識融入學校教育的課程中，以回應回族孩子的需求。

本書共分十個章節，第一章導論，簡述中國地理與民族分佈，並解釋因爲經濟的發展，迫使許多回族人因爲工作而遷移到東部近海地區的大都市。然而因爲多數漢人並不瞭解回族人，因而時常衍生誤解與衝突。即使許多回人已逐漸漢化，許多漢人仍視回族人爲外來的他者。然而多數學校卻未能意識到回族的存在，因此未能在學校的教育與課程上回應回族文化，並化解種種的誤解。第二章回顧了中國的歷史背景，以漢族文化爲主題的中國，向來以「中央」、「中心」自居，視其他少數民族爲「邊陲」、「邊疆」與「蠻夷」。中國歷代王朝，不只是政治上獨大，在文化上，也一直以「老大」的心態自居，兩千年以來獨尊儒術，並以之自豪，而將異族文化視爲野蠻與落後。對於回族，因爲生活方式與思維上的差異，回族一直被漢族描繪成野蠻、行事詭異的一個民族。第三章則從政策面探討了現代中國針對少數民族的政策。第四章探討的則是教育面，凸顯漢族的文化霸權，如何滲透在教育體制與內容的每個層面；而在當代中國崛起的國際關係之下，以身爲中國人爲榮的意識型態，更是強化了漢族的優越。第五章則呈現本研究的理論架構，以後殖民主義爲主軸，回顧了相關的理論，包括混雜、認同、霸權、東方主義等，並立足於現象學的觀點，以敘說作爲主要資料收集的方法。第六章簡述研究對象的場域與環境脈絡，包含社區、學校與家庭。第七章到第九章分別以老師、學生與家長的觀點，探討回族學生在學校、家庭與當代社經發展的脈絡中，他們認爲自己是誰、如何行事，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以及如何看待 / 認同回族這個族群，並從中抽絲剝繭，凸顯他們各自的認同是如何從彼此的相互影響過程中建構出來的。第十章結論，除了談到本研究的意義，更對於中國的多元文化教育提出建議與期待。

評論

本研究從後殖民主義直接切入，批判主流漢族意識支配同化著少數民族的自我意識。19、20 世紀，殖民時代的帝國主義與歐洲主義，對於亞、非與南美等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武力的佔領與統治。在 20 世紀中葉之後，最後一批民族主義國家在政治上紛紛脫離殖民主權而獨立。但所謂「獨立」，往往只是表面上的假象。後殖民主義看見：當第三世界國家從被殖民的地位獨立之後，其實往往未能真正獨立，而是變成一種後殖民地位，也就是原本殖民帝國由原本政治上直接的統治，變爲經濟與文化上的間接統治。殖民國家的在語言、文化方面的霸權優勢仍非常鮮明，仍然以各種方式影響、操作他們的意識型態，並且持續代代複製知識，貶低殖民地的文化，致力於使他們消音，以維持他們與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權力關係（Giroux, 1981；Gramci, 1971）。

後殖民主義主要批判的對象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列強（Said, 1979；1985；1993）。中國雖然不是西方列強之一，但本研究以後殖民主義來批判中國漢族的文化霸權，我覺得其實非常貼切。研究中提到中國雖然不曾成爲列強的殖民地，但部分地區與城市卻曾經成爲列強的殖民地，如青島（德國）、香港（英國）、大連（英國、日本、俄國）。因爲這些影響，所以漢民族複製歐洲殖民者的意識型態，並以之去同化少數民族。但我的想法是：從心態上，其實漢民族本身一直以來就是自認爲世界的「中」心，並認爲其他的民族是「邊疆」與「蠻夷」。被征服的「藩屬」要定期進貢，並且「歸順」中土的天子。在整個東亞地區，中國的文化長期且深刻地影響了周圍的各民族。在十九世紀西方列強入侵之前，中國歷來的王朝幾乎向來不把這些外邦放在眼裡，自然從來不會去重視外來與異族的文化。雖然中國歷史上曾經有元朝與清朝是被異族（蒙族與滿族）統治，但漢人均將之視爲奇恥大辱，一心想「驅逐韃虜」，「反清復明」。雖然在異族的統治下難免有文化上的交流，但從來沒想過歸順臣服於異族的統治。所以在這些朝代，雖然是這些「異族」佔有政治上的權力與地位，但在文化上，他們被漢族同化的部分可能多於他們對於漢文化的影響。即使十九世紀受到西方列強的入侵，造成部分漢人意識到「西化」的迫切性，但漢族的老大哥心態仍可從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以及滿清政府「喪權辱國」這樣的思維中，深刻的展現。對於鄰近的異族，更是一直以高姿態看待之（除了後來對甲午戰爭打敗中國的日本之外）。因此，對於中國境內與鄰近的少數民族，漢人的優越意識一直非常鮮明。因此，在中國歷史上，一直不斷上演著征服異族，並且將之漢化的戲碼。而這本質上其實也和西方帝國主義的武力與文化霸權征服同出一

轍，只是漢人一直不將之視爲一種「侵略」，而是將之視爲理所當然的「開疆拓土」、「開山撫番」。史書上所記載的漢唐盛世，都是以漢人的觀點歌功頌德。但這些強盛的國力與武功的背後，其實本質上就是一連串的侵略、征服，甚至屠殺。因此，其實漢人早在歐洲列強的海外侵略之前，就一直在對鄰近的民族實行帝國主義與後殖民文化霸權。以這樣的觀點，我覺得用這種殖民理論或後殖民理論來檢視與批判漢族的文化霸權，是再貼切也不過了。

本書也針對混雜性做了討論。混雜性指的是西方殖民主義之下的產物，殖民者以霸權操弄文化與意識型態，造成西方主流文化被視爲理所當然，更造成了被殖民者的對本身文化的懷疑與對族群認同的錯亂。混雜的主要意義並非互相影響，而是強者對於弱者的同化。書中也指出混雜性的影響在於：它在被殖民者中創造出了一群仰慕殖民文化的被混雜者，以方便殖民者施行統治。因爲混雜，被殖民者的文化被貶低。然而，被同化後的被殖民者會逐漸產生錯亂：他們既非原本的自己（民族文化），也無法完全融入殖民者（文化）。他們會成爲介於兩者之間的”in-between”。混雜使殖民者不需要使用武力強力鎮壓，也不需要刻意推行任何強加的政策，就能使被殖民者不自覺地被同化，但卻能持續保持被殖民者仍較次級的地位。

書中的主角與他們的父母，正是在漢族的文化霸權之下被徹底同化。書中提到他們以身爲中國人爲榮，但卻未提到他們對於回族的想像（或許除了身分登記之外已經完全沒有想像）。他們也和一般漢人一樣（因爲父母和老師的的期望）都在學業上努力，希望進入好學校，將來找到好工作。所以他們在學校努力讀書，學習漢人的教育意識並將之視爲理所當然，但卻不知道儒家思想的孝道和回族的文化是不相容的。也就是說，只要是學校裡、課本上教的，就是「真理」，且一切以學業優先：學業上得好成績才是最重要的。遺憾的是，兩位主角被混雜到甚至沒有意識到他們是”in-between”。他們知道自己是回回，但僅止於此。他們沒想過自己文化的獨特性，沒想過和漢人有什麼不同，也以身爲中國人爲榮。他們的家庭幾乎已經沒有任何回族的文化與習慣了。因此，他們似乎沒有感到任何的掙扎與衝擊，所以他們甚至連 “in-between”都不是了。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以敘說研究（narrative inquiry）的方式，探索回族學生的生活經驗。敘說探究的研究方法與概念近年來逐漸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形成新興的研究力量，並且形成新的研究科學方法的典範。敘說，呈現的並非單純客觀的角度和普遍通則，而是提供一個彼此理解溝通的脈絡，並藉著經驗的反覆累積，追求與理解我們所處的世界。在此研究者特別在研究方法當中，提到他是以現象學的觀點作爲整個研究的理論框架。如同本研究中所提到的：現象學研究的是人們每日生活的經驗（van Manen, 1990)，以及人們如何描述、如何藉由感官經驗事情（Patton, 2002)。現象學強調的不是從理論出發去解釋現象，而是強調直接接觸生活世界的經驗。這個部分的說明，爲敘說研究何以能夠成爲一種值得信賴的研究法，提出了理論上的支持。許多敘說研究的文獻探討中，都只回顧或說明敘述研究的探索的是研究參與者的生命故事與經驗，藉由經驗的理解與轉述，研究者從與參與者的關係與互動中產生意義。雖然質性與量化之間，不同的科學研究典範間有不可共量性，但如能夠在質性研究方法的背後，提出更有力的理論架構作爲支持與依據，對於這個研究的信度與價值，絕對有加分的效果。Nodding 指出：

> 質化的研究方式已經逐漸變為一種所謂「故事式的研究方式」（narrative research），此時挑戰再一次出現：這是科學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是：不，這不是科學。… 採用這種故事式研究方法的學者們，就必證明他們的方法、來源、報告方式等等，是與人文科學中普遍被接受的方法相符。（曾漢塘、林季薇譯，2000：257）

高敬文也指出：

> 質、量研究派典的差異，不是枝節的方法與技術的差異，而是更根本的方法論上的差異──即基本哲學假定（包括本體論、知識論、倫理學等）、「科學」探究的本質、教育研究的目的與功能...等方面的不同見解之爭辯。
> （高敬文，2002：127）

Mead（1934）認爲「認同」的概念與「自我」的概念關係十分密切。而「自我」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經由個人與外在環境及重要他人之間的探索與互動而產生心裡的經驗，然後將此心裡的經驗內化與組織（引自 Borich, 1999，p. 93）。因此認同具有動態、流動性與社會建構的本質。Helms（1998）則認爲自我概念的形成不僅是由一個人的行爲或喜好所塑造，也來自於他/她所相信的價值，以及他/她所想要成爲的那種人的特質。

本書採敘說研究，探討的是回族國小女孩的生命族群認同。但在資料收集方面，本研究除了訪談兩位主角──兩位回族小女孩──之外，也訪問了他們的父母與學校老師。另外，作者也採了課室觀察與家庭訪問。在此我們看到了這兩位小女孩身邊的人的想法，也看見了他們在學校上課的情形與家裡的環境布置。透過多方的資料收集與描述，作者試圖將視角跳脫出教室或研究室，以滲透到這兩個小女孩生活中的每個角落，試圖看見小女孩的生活與學習環境與他們的族群身份認同之間的關連。而與家長和老師的訪談，也看見他們老師的態度與家長的認同，是如何影響孩子對於自己族群與身份的理解。

在本研究中，作者在談到研究倫理的部分時，特別談到自己身爲「漢人」與「學者」這樣的身分，也擔心自己會落入以「高位」看「低位」這樣的角度，而在不知不覺中以自己的看法去解釋一切。這其實也是大部分的研究者可能面臨的問題。因此，

他以深入且全方位的探討──從中國漢人的傳統、當代漢族意識與族群政策，教科書中的文化霸權，到這兩個小女孩生活的家庭、社區、學校等──的深入探討，呈現一個整體的環境與脈絡。作者以這樣的方式作通盤的探討，搭配自己的訪談與觀察，試圖避免自己的偏見與偏頗。在質性研究中，這是合理且難以挑剔的一種手法與論點。這樣豐富的觀察與對照，其實是此類研究的一個極佳的範本。

建議

針對本書的內容，我針對一些我覺得不足之處，提出我的建議與想法。首先是對於回族的認定。回族一般被認爲是中華民族五大族──漢、滿、蒙、回、藏──其中之一。但回族和其他民族不同的是：所謂「回族」，實際上並不像一般民族一樣，是以血緣爲聯繫的一個「民族」。即使所謂的民族可能只是「想像的共同體」（Anderson, 2010），但通常還是有一種血緣上的想像。但回族卻是一個以宗教爲想像的一群人。所謂「回族」的稱呼名稱，最早源自民國初年的「五族共和」口號（華濤、翟桂葉，2012）。之前民間多用「回民」或「回回」一詞泛指中國境內的穆斯林（伊斯蘭教徒）。他們的來源可追溯至唐朝，從中亞波斯與阿拉伯等地來的穆斯林商人，因此原本就不是血緣上有關連的一群人，而是信奉同一宗教的一群人。經過數百年與漢民族的通婚、融合之後，他們在明朝被迫冠漢名、學漢語、穿漢服，並學習漢文化與儒家思想。他們雖然逐漸被漢化，但他們大多仍然保有不同於漢人的文化，因爲他們仍以清真寺爲生活中心，伊斯蘭教在他們的生活中仍然佔有重要的影響力。所以他們逐漸從 Muslims in China 逐漸變爲 Chinese Muslims，成爲一種的特殊的「族群」。

作者雖然在第二章有提到回族的歷史淵源與背景，但對於所謂的回族這個概念，我覺得其實可以在第五章回顧與本研究相關的理論架構的部分，提及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體」的概念，並且以此概念，在後面的訪談部分延伸探討。特別是在經過多年的漢化之後，在現今的時代，書中所提到兩位主角 Lingling 和 Lanlan 幾乎已經完全與漢人一樣，完全就是漢人的思維。他們也自認爲和漢人並沒有不一樣。而他們兩位的父親，即使家中已經完全沒有回族的裝飾與布置，即使他們都已經不念可蘭經，即使對於伊斯蘭教也所知甚少，甚至於幾乎也已經不向阿拉祈禱，但他們還是自認爲「回回」。在非自治區、原本就不以血緣爲聯繫的回回，現在連宗教的影響力也急速消退的環境下，幾乎完全就是以「想像」來維繫這個族群。這是我覺得可以使本書更豐富的內容。

另外，本書作者爲求觀看到兩位回族小女孩家庭生活與學校生活的全貌，不僅針對小女孩進行訪談、訪談了他們的父母與老師之外，還進行了家庭訪問與課室觀察，希望可能窺得他們生活中各方面的面貌，以探究這些身邊的人與環境對他們族群認同的建構我造成的影響。這樣的佈局看似全面，但我個人覺得，如果能加入小女孩和班上同學在下課時的互動的觀察，並與班上同學進行訪談，這個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必然更加全面。以一個小學生的一天來說，與家長接觸的時間（扣除掉晚上睡覺之後），其實相當有限。與老師的互動也是一樣，多半僅限於有限的上課時間。但學生在下課、休息時與同學的互動，其實對於他們的自我意識與認同，一定會有重要的影響。但本研究中，這方面的內容幾乎完全沒有，這是讓這個研究另一個美中不足的地方。

還有一個問題是關於本書的研究焦點：本書的書名是”*Language, Culture and Identity among Minority Students in China: The Case of Hui”*。依據這樣的標題，會讓讀者預期書中會有某一部份（甚至是很大的部分）在探討回族在語言上面臨的流失與危機。但是在 12 頁本書的研究問題中，卻可發現其中根本沒有探討到任何跟語言有關的內容。也因此在書中幾乎看不到作者針對回族語言部分的探討。特別在第一章的第一頁，作者已提到”Fifty-three minority groups have their own spoken languages; Manchu and Hui speak Mandarin Chinese (Zuo, 2007)”。除了少數住在回族自治區的回回之外，絕大多數回族已經以漢語爲第一語言與溝通語言了。以本研究來說，書中的兩位主角都是在漢人的居住的城市中生長，他們的父母也只會說華語，因此他們也完全沒有面臨到語言方面的失落與掙扎。因此，我覺得本書的書名應該去掉 language 這個字，以免讓讀者有錯誤的預期。

另外有一個我覺得作者想要觸及，但是卻沒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探討的部分，是有關女性的議題。作者在一開始提到與本書相關的研究中，曾提到回族自治區女孩的高輟學率；第四章呈現的學校教育內容中，特別提到了課本中的女性形象與男性形象的不對等；第五章也提到殖民者常將女性受到的不公平對待予以消音，或做出錯誤的表述。另外，在本書中的兩位主角，也都是小女孩。感覺上，作者除了探討少數民族的認同危機之外，似乎也想聽見女性的聲音。但後面小女孩的訪談內容中，卻沒有能夠扣住前面那些關於女性議題的內容。這是我覺得本研究或許可以再深入探討的部分。

結語

本書提供了歷史上、政策上與課程上的背景，幫助讀者瞭解在中國內地 / 沿海地區回族學生的生命經驗，並探討了漢族與回族的文化差異。在研究理論上，本書以後殖民主義的理論，抨擊了霸權文化藉著學校教育同化少數 / 弱勢民族，批評學校教育以漢族的思維建構回族學生的身分認同。另外，書中也進一步探討了不只是在中國，同時也正在全球進行的主流課程再現，以及對於中國的多元文化教育的期待。整體而言，本書而以博士論文來說，本書內容深入淺出，走文脈絡與敘述條理分明，章節組織嚴謹。對於有志從事質性研究的初探者而言，實爲可參考的極佳範本。

參考書目

高敬文（2002）。*質化研究方法論*（修訂二版）。台北：師大。

華濤、翟桂葉（2012）。民國時期的「回族界說」與中國共產黨《回回民族問題》 的理論意義，*民族研究*， 2012 年第 1 期。瀏覽網址：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http://www.xjass.com/ls/content/2012-06/12/content_235243.htm

曾漢塘、林季薇（譯）(2000)。*教育哲學*。台北：弘智。

Anderson, B. (2010).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吳叡人, Trans.), 頁 5-199. 台北: 時報.

Borich, G. D. (1999). Dimensions of Self that Influence Effective Teaching. In R. P. Lipka, & T. M. Brinthaupt (Eds.), *The Role of Self in Teacher Development* (pp.92-117). N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Giroux, H. A. (1981). *Ideology, Culture, and the Process of Schooling*. London: Falmer Press.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Helms, J. V. (1998). Science and Me: Subject Matter and Identity in Secondary School Science Teacher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35*(7), 811-834.

Patton, M. Q. (2002).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Said, E. W.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Said, E. W. (1985). Orientalism Reconsidered. *Cultural Critique*, *1*, 89-107.

Said, E. W.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f.

van Manen, M. (1990). *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 Human Science for an Action Sensitive Pedagog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Zuo, X. (2007). China's Policy Towards Minority Languages in a Global Age. *Transnational Curriculum Inquiry*, *4*(1), 80-91. Retrieved November 5, 2007 from http://nitinat.library.ubcca/ojs/index.php/tci

【回首頁】

課程系系友榮譽榜

本系多元所碩士班畢業生何亭嫻同學高中新北市 103 學年度英語科正式教師甄試！

本系 劉唯玉 主任榮獲 103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典範獎！

本系多元所碩士生 陳曉雯 同學榮獲 103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楷模獎！

本系多元所碩士生 林曉妮 同學考取 103 年花蓮縣正式專任輔導教師！

本系多元所碩士生 曾秋明 同學考取 103 學年度國民中學聯合甄選正式教師！

本系學士班 100 級 何孟翰 同學高中 103 年苗栗縣國小教師甄試一般科正式教師！

本系學士班 102 級 莊千儀 同學高中 103 年台中市國小教師甄試一般科正式教師！

本系教育所碩士生 蘇映陵 同學高中 103 年台中市國小教師甄試一般科正式教師！

本系科教所碩士生 林建毅 同學考取新北市自然科正式教師！

本系科教所博士生 林義涵 同學遴選榮任宜蘭縣五結鄉中興國小校長！

【回首頁】